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一时间,有关三孩生育政策(三孩政策)的话题引发民众关注。

甜蜜的“负担”

在北京打拼8年多的吴一,在双方父母催促下刚刚生完二胎半年。半年来,一家6口挤在6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里,生活中的小摩擦以及经济上的压力,让她身心俱疲。

刚休完产假开始上班,吴一每天中午要赶回家给二宝喂奶,来不及午休就返回公司。“有天在地铁上看到一位打扮精致的女孩,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很久没买过新衣服,也很久不化妆了。”吴一失落地说。

为了方便大宝上学,也为了离单位更近,一家人决定将北五环外的房子出租,搬到出租屋。“让老公的父母来北京帮忙照顾孩子,省钱也放心。”吴一说,二宝出生后,6口人住在了一起。

吴一打开支付宝账单,满满都是尿不湿、婴儿衣服、身体乳、爽身粉等等的购买记录。“现在后悔没把老大用过的一些东西留下来,又得再花钱。”吴一说,目前老公父母的退休金加上夫妻俩的工资,几乎全部用于每月家庭的基本开销。

吴一也想过做全职妈妈,但看一眼账单就打消了念头。前程无忧发布的《2021职场妈妈生存状态调查报告》显示,职场妈妈的收入已成为支撑家庭的重要来源。45.2%的受访职场妈妈的个人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一至三成,36.2%的个人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三至五成。子女教育和住房是职场妈妈最主要的支出。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目前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从

2010年的16.6%提高到2020年的17.95%。近年来,由于政策调整原因全国累计多出生二孩1000多万人。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近年来的50%左右。出生人口性别比从2013年的118降至目前的111左右。但我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以来仍是“四连降”。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之外,凡是有孩子的家庭,其“生活账本”都是沉重的:湖南常德的陈晓明今年27岁,有个两岁的儿子,孩子每月上早教班、日常吃穿用的花销在5000元左右;

在西北县城工作的一位父亲称,每月给孩子的花费至少1000元左右,而他的月工资只有3000元;

在湖南怀化一所乡村小学做教师的黎女士说,孩子不到3岁,每月至少得花去工资的三分之一。

各种成本的加成,让年轻人在生育之前要盘算更复杂的经济账。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以前多生一个孩子,不过是“多添一双筷子”,但今天,那双筷子变成了“黄金”做的。

“没人帮忙带孩子”是杨玲不敢生二胎的主要原因。她生活在辽宁鞍山,孩子已经7岁。“要二胎,除非全家合力一起面对,否则女性牺牲太大。”她说,身边有多名女同学生二胎后选择成为全职妈妈。“都是在事业上很优秀的女性,但没办法,孩子没人照顾。”

目前,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托育机构供应明显不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数据显

示,我国0至3岁婴幼儿入托率只有5%左右,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我国家庭的婴幼儿照顾方式仍旧以父母和双方长辈照顾为主。

孩子长到3岁,在很多大城市,想上个理想的幼儿园往往很不容易。“我考察了距家开车半小时内的所有幼儿园,发现私立条件好的太贵,收费低的品质又不行。”在广州生活的陈蕾说,为了让孩子进入一所热门的公立幼儿园,她想尽了办法,经历一番“15选1”的残酷竞争,才得以成功。此后,她再也不敢考虑生第二个孩子了。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目前,我国“9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1.66个,比“80后”低10%。“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相当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指出。具体来看,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

在原新看来,不仅是城市,目前我国农村也进入了低生育意愿的时代。

湖南邵阳农村的刘瑞,生孩子前辞掉城里打工的工作回老家。“全家就只能靠我爱人务工挣钱,怀孕、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感觉经济压力很大。”

“农村夫妻生育意愿不断降低有多重原因。”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说,一方面,大量年轻人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面临更大生活压力;另一方面,传统的生育文化已经改变,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观念在淡化。

“高龄少子”之困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一方面,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8.70%,较2010年上升5.4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远低于人口学上2.1的世代更替水平。“高龄少子化”的趋势逐渐加深。

为应对人口变局,我国生育政策持续放宽。从2013年的单独二孩、到2016年的全面二孩、再至“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今日的三孩生育政策早有铺垫。

“在现阶段放开三孩政策,首要考量的因素,是我国生育率持续低迷,少年儿童占比仍处在较低水平。”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说。

我国总和生育率指标连年下降。根据调查数据,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一对夫妇所生育的孩子数量)数据为1.3。这一数字意味着什么?民政

部部长李纪恒此前曾撰文表示: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1.5的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从儿童占比来看,陆杰华指出,受二孩政策影响,我国0—14岁儿童占比在2020年达到了17.95%,较2010年上升1.35个百分点。但从整个人口结构来看,这一数据仍占比不足,我国人口结构问题依旧突出。

基于以上现实考量,陆杰华认为,由于我国生育率和出生人口已经连续年走低,尽管二孩政策和优生优育政策让儿童占比有所回升,但这一力度仍旧不足,因此进一步放开三孩已是势在必行之举。

浙江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军认为,三孩政策反映出我国生育政策背后发生变化的脉络——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生育政策会逐渐放开,我国也会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相应调整。刘志军表示,三孩政策其实

已酝酿至少一年以上,“十四五”规划纲要中谈到,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这也是有关人口政策的新说法。这个政策的公布是预期中的,是在“七普”数据出来后的一个意料之中的政策发布,说明对于放开三孩的认知和共识已非常强烈。

刘志军认为,现在大家已意识到不会出现人口过多的生育阶段,这时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应对人口结构和数量的均衡发展。这实际上是一个软着陆的过程,慢慢调整,在此过程中观察社会反应,然后再调整。应该说,这项政策是很自然的过程,也符合民众的预期和认知。毕竟政策出台之前,还需要经过社会审慎的论证过程。

三孩政策落地,你拼不拼?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意义

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家庭

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

教育

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

支持

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年龄虽非最佳但问题不大

三孩生育政策到来,很多妈妈都面临年龄偏大的问题。据介绍,女性最佳生育年龄在30岁之前,但其实35岁之前都属于正常生育年龄,超过35岁才算高龄孕妇,超过45岁,风险就比较大了。

不过,即便到了40岁,进入高龄产妇行列,风险虽然增大,但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监测水平的提升,出生缺陷防控能力的增强,女性身体素质的提高,生个健康宝宝依然充满希望。

孕产评估很重要

有的妈妈担心,自己曾经剖腹产,子宫留下疤痕,会不会影响继续生育。对此,专家表示,第一次生育时剖腹产,第二次生育不会有太大风险。如果前两次都是剖腹产,那么第三次生育的风险会很大,原则上不建议继续生育,因此,提倡自然分娩很有必要。

不管风险大小,想要三孩,做好孕前全面评估非常重要。需要对剖腹产后子宫疤痕情况进行评估;筛查卵巢、宫颈、盆腔等部位的妇科疾病,提前治疗;备孕前应均衡饮食、规律作息;控制好体重,胖要减肥,瘦要增重,戒烟戒酒(包括丈夫在内);保持心理健康,解除精神压力,预防孕期及产后心理问题发生……

配套亟待跟上

专家指出,生育政策对于生育意愿以及实际的生育水平依然能产生影响,但仅凭放宽生育,还是难以扭转低生育率的局面。

何以破局?6月1日,国家卫健委就三孩生育政策答记者问时表示,要降低住房成本、就业负担,让大家生得起;发展普惠教育,提高幼儿托育比例,让大家养得起,才是三孩政策的题中之义。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住房已经成为生育上的一大经济关。“把地稅部分返回给多孩家庭,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房地产改革政策。”携程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人口学者梁建章分析称。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表示,在推出三孩政策后,国家更重要的是完善配套的包容性措施,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比如给予更加公平的教育机会,增加幼儿园数量,改善择校等方面的措施。放开三孩政策之后,最重要的还是建立生育友好环境。国家已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这两年后续措施的出台和落实进程应该会很快。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看来,相

比“放开三孩”前半句,“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后半句意义更重大。会议决议后,很多配套支持政策会有实质性调整,以此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降低家庭的教育养育成本。

以0—3岁孩子托育为例,考虑到托育压力大,上海这几年正在建立托育服务体系。但可以看到,2018年至今新增的托育机构大部分是民办,公办机构总体较少。论及大力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专家认为,还应给予民办机构补贴,或新增公办机构。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更多省市也将陆续出台政策。

至于住房、税收等政策支持,周海旺认为,有许多方面亟待解决。二孩、三孩家庭居住空间要求更大,目前这样的家庭为了改善住房,卖了首套贷款买第二套,首付70%、贷款利率也要上浮,政策尚未考虑到鼓励生育,希望未来也能有所调整。

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教授杨燕绥认为,育儿假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向。具体来看,可以考虑将育儿假延长至一年半甚至两年。与此同时,考虑到女性上班的需求,父亲、母亲都可以拥有体育儿假的权益。“而且生多个孩子的话,育儿假可以放得更长一些。”杨燕绥说。

低生育率并不罕见,发达国家以及较富裕的发展中国家都会出现此问题。其他国家是如何解决的呢?2006年,俄罗斯颁布实施了“母亲基金”法案,对两个以及更多孩子的家庭提供补贴。孩子的父母在孩子未满1.5周岁期间可以享受的最低生活补贴一胎每月1500卢布,二胎或二胎以上补贴3000卢布;瑞典则是世界上第一个立法对男性休产假做出规定的国家。在休够法定的60天产假后,父母每多休30天产假,就可多领取3000克朗奖金。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所社会政策室主任张本波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在养育方面,国家还可能要提出进一步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家庭养育的成本。实际上,“十四五”规划就提出了发展普惠教育的相关项目——在150个城市通过发展普惠的综合中心和社区中心提供50万个普惠托位。

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幼儿园数量快速增长,2020年中国幼儿园数量达29.17万所,同比增长3.7%。与此同时,幼儿数量快速攀升,2020年中国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数量达4083万人,同比增长高达14%。

带娃难、入园贵已经变成了普惠教育的重点难题。“要让不同的社会力量能加入到兴办托幼事业的行业当中来。”原新认为,“十三五”时期,国家出台了多份文件,制定了关于托幼服务发展的指导性意见规范、标准等,“十四五”期间应抓紧落地,而民间资本等社会力量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与此同时,相关政策也在加大对民办幼儿园的扶持。去年4月,教育部发文鼓励具备条件且有意愿的民办园转普,转普后将享受房租、税费等各项补助,保教费也将按照普惠园价格收取。

(本版文字综合自新华社、环球时报、成都商报、北京商报、上观新闻等媒体报道)

